

续，罗作施改，说法很多，我们赞成鲁迅的说法：“简本撰人，止题罗贯中，……比郭氏本出，始着耐庵，因疑施乃演为繁本者之托名，当是后起，非古本所有。”这个说法，认为罗贯中是原始（简本）《水浒》的作者，施耐庵是加工（繁本）《水浒》作者的托名。

关于罗贯中和施耐庵的资料，简介如下：

罗贯中是元末明初（十四世纪中期）的戏曲、小说作家，一名贯、或本、或道本，字名卿，号湖海散人。他的籍贯，有的说是太原，有的说是东原或中原，有的说是钱塘。贾仲名的《录鬼簿续编》有他的小传，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十四篇曾作综合的介绍。他写的杂剧现存《宋太祖龙虎风云会》（《古本戏曲丛刊》第四集收顾曲斋《古杂剧》本、《古名家杂剧》、《醉江集》本），小说有《三国演义》、《隋唐志传》、《残唐演义》、《三遂平妖传》等。他是属于正统儒家思想十分严重的“书会先生”，特别是从《三国演义》、《三遂平妖传》里，可以看出他对农民起义的仇视。当然，这些作品“皆屡经后人增损”（鲁迅语），不一定都是他的原作。

施耐庵过去曾有人说他是写南曲《拜月亭记》（即《幽闺记》）的施惠（吴梅《顾曲麈谈》，据抄本宝敦楼《传奇汇考》）。惠字君美，或作君承，钟嗣成《录鬼簿》里有他的小传，也是元末明初人。又有一种说法，他本名施耳，字子安，生元成宗元贞二年，卒明太祖洪武三年（1296—1370），原是兴化白驹场人，元末曾在杭州作小官，后来回到故乡，张士诚邀请他参加农民起义军，他拒绝了（近人袁吉人《耐庵小史》引《吴王张士诚载记》卷四；《文艺报》1952年21期有《施耐庵与〈水浒〉》，《施耐庵生平调查报告》）。这些材料，是否可靠，尚无定论。鲁迅怀疑“施耐庵”是加工改写者的“托名”，对施耐庵其人的身世是持审慎态度的。

罗、施都不是过去有些人吹捧的什么“平民文学之文豪”、“我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而是地地道道的为反动封建政治服务的知识分子。毛主席说：“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

《水浒》的作者不管是罗是施，也不必过多地用力去考证那些似真似假的材料。他给我们留下了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作品，也就可以作为我们检验他的主观愿望的重要依据，来对他进行评论了。

《水浒》的要害是投降

《水浒》这部书的主要倾向是什么？从它问世以来，一直众说纷云。其实，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鲁迅先生早就说过：“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这个评语，完全正确。它指出了《水浒》的要害是“受招安”，即投降。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关于《水浒》的许多评论，几乎都违背了鲁迅的论述。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些评论文章，虽然没有象以前那样吹捧《水浒》是“歌颂农民革命斗争”的“千古不朽的农民革命的史诗”，但仍认为它“对人民革命力量的赞颂和对反动势力的鞭笞和嘲讽，在封建时代的文艺战线上是一个大的突破，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变革”，因而

“具有强烈的革命性”。对于这些错误论调及其影响，必须通过对《水浒》的评论，予以澄清。

翻开《水浒》来看，它从头至尾，歌颂的根本不是农民的革命斗争，而是阶级合作、阶级投降。它根本否认“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根本否认“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小说的“引首”一开头就歌颂赵宋王朝的所谓“盛德”，说什么“圣人出世，红光满天”，“自古帝王都不及这朝天子”。在第一回中，《水浒》又用“张天师祈禳瘟疫，洪太尉误走妖魔”的故事告诉人们，皇帝是“救济万民”的“圣明天子”，人间的治乱祸福全由“天命”：不仅宋王朝是“应运而生”，就是农民起义队伍中的一百〇八个头领也是天遣的“魔君”来世上历劫，要他们退净“魔心”，“去邪归正”的。这样一来，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关系，就不再是两个敌对阶级的关系，而是同样奉了“天命”而来，为行“天道”而生的了。“高俅奸佞虽堪恨，洪信从今酿祸胎”，就这样，《水浒》的作者以孔孟之道的“天命论”作为思想基础，通过洪信放走大唐洞玄法师镇锁的一百〇八个妖魔的荒诞情节，向读者展现了一支农民起义队伍发生、发展和向反动统治阶级投降的全过程。

毛主席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为了更好地认清《水浒》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要害，根据小说的顺序，我们分三个部分来剖析这部反面教材。

第一部分：从第二回“王教头私走延安府，九纹龙大闹史家村”到第四十一回“宋江智取无为军，张顺活捉黄文炳”，是《水浒》关于社会矛盾的描写，由此为全书定下了“所反对的是奸臣，不是天子”的基调。

列宁曾经指出：“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北宋末年的时代特点是什么呢？这时正是地主阶级建立了绝对统治并开始走向反动和腐朽的时代，是农民阶级聚力量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进行猛烈冲击的时代。当时，阶级斗争尖锐激烈，农民革命风起云涌。与宋江同时的方腊，就尖锐地揭露了北宋这个封建王朝“是法平等无，有高下”；帝王“酷虐”，“官吏侵渔”，“独吾民终岁勤动，妻子冻馁”，“江南之民苦于剥削久矣”。而《水浒》却根本否认这个阶级斗争的严重现实，用“天下无事太平日，萼花无限日高眠”来歪曲时代特点，为赵家反动统治涂脂抹粉。它说什么宋徽宗“登基之后，一向无事”，“天下尽皆太平”；只因高俅发迹当权，“蒙蔽”圣上，“屈害忠良”，才出现了梁山一百〇八人同高俅、蔡京、童贯、杨戩和梁中书的矛盾和斗争。在作者笔下，皇帝是好的，“变乱天下，环国环家环民”的只是这几个“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的奸臣。广大农民反对以皇帝为首的整个地主阶级统治的革命，就被别有用心地歪曲为“忠义”与“不忠不义”之争。王教头私走延安府，林冲雪夜上梁山，鲁智深二龙山落草，晁盖智取生辰纲，等等，无一不是作者按着这个所谓“忠奸之争”的规格炮制的。从第十八回起，《水浒》让他的主人公宋江出了场。作者一开始就把宋江打扮成“忠义”的化身，以“杀惜”、“闹青州”、“题反诗”等情节来表现“不容

忠义立家邦”的“奸”逼“忠”反。用宋江同高俅的斗争，取代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的根本对立和生死斗争。其实，“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这一派在地主阶级中属于饿狗、小狗一类，与高俅这类饱狗、大狗不同。他们不甘心处于无权的地位，加上又屡受高俅这一派的打击和排斥，就更加增强了他们争权争势的欲望。因此，他们之间的斗争，不过是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之间的一点特别有趣的争斗罢了。

“忠为君王恨贼臣”。只反贪官，不反天子，这就是《水浒》鼓吹投降主义路线的基调。在敢不敢把斗争矛头指向以皇帝为头子的地主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这个根本问题上，《水浒》用歪曲时代特点，抹煞阶级斗争的卑劣手法，鼓吹“忠君”，散布对皇帝和“好官”的幻想，麻痹农民阶级的革命意志，取消农民阶级夺取政权，推翻皇帝的斗争，这正暴露了作者敌视农民革命的反动立场。

第二部分：从第四十二回“还道村受三卷天书，宋公明遇九天玄女”到第八十二回“梁山泊分金大买市，宋公明全伙受招安”，写宋江上梁山推行“受招安”路线。

《水浒》是一部叛徒的颂歌。为了鼓吹投降，宋江刚上梁山，《水浒》就安排了一个宋江告假回乡，还道村遇九天玄女的情节，用“天意”把宋江包裹起来，提出了“替天行道”这个投降主义的政治纲领。

在“替天行道”的纲领下，作者拼命贬斥晁盖。就在四十二回受“天书”的情节里，作者借九天玄女的口告诉人们：“天书”同晁盖无关，晁盖不“上应天星”，根本没有“替天行道”的资格。为了让宋江“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作者还用曾头市一战（六十回）写晁盖不顺天意，不听劝告，让他中箭而亡，屏晁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无论是三十六“天罡”，还是七十二“地煞”，都没有了晁盖的位置。为什么？在七十一回中作者有一段自白：“在晁盖恐托胆称王，归天及早；惟宋江肯呼群保义，把寨为头。休言哨聚山林，早愿瞻依廊庙。”因为晁盖坚持的是“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的农民革命路线，要“托胆称王”，因此作者要他“归天及早”；宋江“早愿瞻依廊庙”，“尽忠报国”，能把梁山起义军引向投降，所以让他“把寨为头”。作者对晁盖革命路线的刻骨仇恨不是已经跃然纸上了吗？

在“替天行道”的纲领下，作者拼命地美化统治阶级的招安策略，斥朝廷“征剿”派为“奸邪”，赞“招安”派为“忠正”，无耻地美化反动统治者“软刀子割头”的毒计。他赞美宿元景“仁慈宽厚，待人接物，一团和气”，歌颂张叔夜“济州太守世无双，不爱黄金爱宋江。信是清廉能服众，非关威势可招降。”他吹捧皇帝“至圣至明”，因为他“知道怀柔胜征伐，悔教赤子受创伤。”

在“替天行道”的纲领下，作者大写宋江等乞求招安的“忠心”，特意编造了一段“石碣天文”的鬼话。以所谓“上应星魁”，肯定了宋江“把寨为头”的地位；又用“上苍分定为大小二等，天罡、地煞星辰，都已分定次序，众头领各守其位，休分争执，不可违了天言”，全面肯定了宋江投降主义的组织路线；最后又用一篇“道梁山泊好处”的四六骈文，以人性论和阶级调和论赞美宋江“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只待朝廷赦罪招安”的投降主义政治路线。接着，作者又把宋江亲自上东京，走李师

师的门路，打通“枕头上的关节”，“告一道招安赦书”的奴颜媚膝，说成是“以求正果”，无耻地鼓吹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

在“替天行道”的纲领下，作者在第八十二回中通过对“受招安”的描写，情不自禁地呼叫“投降有理”，“叛卖有功”。在这一回里，《水浒》用浓彩重墨把受招安的场面作为盛大节日来描绘：把屈膝投降说成是“顺天护国”；把奴才找到了主子说成是“义士今欣遇主，皇家始庆得人”；把宋江等跪在皇帝面前“山呼万岁”，说成是“旷荡皇恩”。不仅如此，作者还硬拉上“东京百姓军民，扶老挈幼，迨路观看，如睹天神”。这就充分地暴露了作者美化叛徒，鼓吹投降的反动立场。

必须指出，反对招安还是接受招安，这是梁山泊起义军中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氏三雄是好的，不愿意投降。但是作者始终让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占统治地位，并给以吹捧；而对以李逵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则处处给予嘲笑和否定，用以反衬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的所谓“正确”。总之，招安好，投降好，这就是一部《水浒》的主题歌。

第三部分：从第八十三回“宋公明奉诏破大辽，陈桥驿挥泪斩小卒”至一百二十回“宋公明神聚蓼儿洼，徽宗帝梦游梁山泊”，写宋江“替天行道”，终成神明。

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打方腊之前，作者还给宋江安排了征辽、平田虎和平王庆的情节，让他“外夷及内寇，几处建奇功”，极力歌颂宋江投降后甘当反动统治阶级的鹰犬的丑恶行为。为了让皇帝放心，《水浒》在宋江出师前，不但让他感激涕零地再次对徽宗表明自己“披肝沥胆”，“竭力尽忠，死而后已”的心迹，而且还要宋江以“挥泪斩小卒”的实际行动，来证明他确是一个谨守“王法”的良臣。

宋江征辽，小说是写成胜利了。过去《水浒》的研究者也认为这“表现了宋江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究其实，这不过是给北宋王朝的卖国政策盖上一块遮羞布而已。据史书记载，北宋末期辽已衰落，当时宋同金曾联合反对过辽国。但结果呢，辽消灭了，金却长驱而下，灭了北宋。《水浒》歪曲这个历史事实，大写宋江征辽的“功劳”，正反映了作者为了掩饰宋王朝的民族投降主义，用心可为良苦。在征辽中，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在破兀颜统帅的混天象阵时，九天玄女又和宋江见了一面。这一面是作者精心安排的。它告诉人们，宋江是真的“顺”了“天”的。“忠义坚守，未尝少怠”，这是作者借九天玄女之口来表白自己对宋江的肯定。“保国安民，勿生退悔”，这是作者为宋江镇压方腊等农民起义所埋下的伏笔。就在这种“保国安民”的幌子下，作者让征辽后的宋江放心大胆地去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

一部《水浒》对不“替天行道”的强盗，是竭尽污蔑、诋毁之能事的。他把田虎这个猎户写成是一个“专一交结恶少”，“捏造妖言，煽惑愚民”的“歹徒”。把王庆这个被官府逼得走投无路的开封府下级军官，写成是“无赖子弟”，认为他后来之被“凌迟处死”，“此是恶人榜样，到底首首戕身；若非犯着十恶，如何受此极刑。”对方腊，《水浒》更是切齿痛恨，把他占据八州二十五县，改建年号，“南面为君”，“图王霸业”的革命行动，诬为“损害生灵，人神共怒”；并制造谎言，说百姓都是反对方腊起义的。在一百一十二回宋江攻常州城时，作者写道：“那时百姓都被方腊残害不过，怨气

冲天，听得宋军入城，尽出来助战。”为了宣扬宋江的“替天行道动天兵”，作者还为宋江把方腊起义军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江红”和把方腊义军将领“剖腹挖心”“碎尸万段”的血腥罪行歌功颂德。宣扬什么“宋江重赏升官日，方腊当刑受刚时。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用方腊的牺牲作为反衬，美化追求升官发财而叛变投降的宋江，诬蔑斗争不屈而英勇捐躯的农民革命英雄。

相反，对这三次农民起义军中的叛徒和内奸，作者则是尽情歌颂。琼英这个从内部攻破田虎堡垒的内奸，作者赞美她尽了“孝道”，是个“忠烈”女子。萧嘉穗这个无耻的叛徒，在王庆占领的荆南城发动叛变，杀死守将，献城宋江，则被作者歌颂为“一个真正有男子气的须眉丈夫”和“壮士”。方腊军中的叛徒全节，作者对促使他叛变的老婆大书特书，胡说什么“弃暗投明免祸机，毗陵重见负羁妻。妇人尚且存忠义，何事男儿识见迷”，鼓吹投降有功。这里，所谓“孝道”、“壮士”、“忠义”，统统都成了叛卖投敌的同义语。这就更使我们看出《水浒》确是一部叛徒的颂歌。

小说最后，作者为了让宋江“忠义双全”，还在他临死之前大做文章，极力表明宋江至死忠于天子，“毫无异心”，成全了“一生忠义清名”。本来，宋江之死，是地主阶级内部两派斗争的结果，也是走狗和奴才的可耻下场。但《水浒》挖空心思地让走狗“升天”，把奴才神化，使宋江成了“万民顶礼”的梁山泊土地神。“千古为神皆庙食，万年青史播英雄”，《水浒》在叛徒头上安光圈，使人不感到无耻叛徒下场的卑劣，制造所谓“悲壮”的气氛，其目的无非是幻想以后多出几个宋江，使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永世长存。

“混沌初分气磅礴，人生稟性有愚拙。

圣君贤相共裁成，文臣武士登台阁。

忠良闻者尽欢欣，邪佞闻时俱忿怒。

五代相传至宋朝，罡星熬曜离天角。

宣和年上乱纵横，梁山泊内如期约。

百单入位尽英雄，乘时播乱居山东。

替天行道存忠义，三度招安受帝封。

二十四阵破辽国，大小诸将皆成功。

清溪洞里擒方腊，雁行零落悲秋风。

事业集成忠义传，用资谈柄江湖中。”

这首诗既是《水浒》作者对全书的概括，也是作者鼓吹投降的自供。他以孔老二的“天命论”作为其反动历史观的基础，大力宣扬以忠君为核心的封建观念，通过美化投降派宋江，进行“投降有理”的反革命说教；用只反贪官，不反天子——接受招安——镇压农民革命的投降主义路线的三部曲，来瓦解和镇压农民的革命斗争，为挽救地主阶级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效劳。《水浒》的确是一部对革命人民有益的反面教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它，批判它，可以使人民知道什么是投降派，从而学会在复杂的斗争中识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